

20世纪30年代都市小说的主题表达

甘宇慧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 浙江杭州, 310000)

摘要: 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都市的畸形繁荣,都市文学逐渐兴起。现代都市作家一方面被都市文明所代表的现代性所吸引,另一方面又常常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审视和批判具有“异质性”的都市文明,尤其是都市文明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发展的负面效应。因此,这一时期的都市小说在主题表达上,往往呈现出一种与现代西方文学及中国传统文学都迥异的特质,一些极具都市文化特性的异化主题、漂泊主题、性爱主题等,在小说的表达上,都带有明显的现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纠缠的痕迹。正是在这种纠缠与挣扎中,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现代都市文学的主题表达,具有一种独特的现代性价值内涵。

关键词: 都市小说; 异化主题; 漂泊主题; 性爱主题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5)03-0212-06

李欧梵在《现代性的追求》中曾这样谈论欧洲现代文学,认为“欧洲自十九世纪以降的文学几乎完全以城市为核心”^[1],对于进入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欧洲文学发展来说,也许这是一个规律。然而,对于有着五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古老中国来说,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却始终是一个陌生的存在。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说,“五四”时期的创作,如鲁迅的《呐喊》,所展现的虽然也是现代中国的现实人生,但却是“受不着新思潮的冲激”,“难得变动”的“老中国的暗陋的乡村,以及生活在这些暗陋的老中国的儿女们,但是没有都市,没有都市中青年的心的跳动”。可以说,直到20世纪初,中国文学基本上还是以乡村为核心。虽然当时大部分新派的知识分子居住在都市中,但他们的视线仍然习惯性地投向乡间。鲁迅在谈到新文学的小说创作时曾指出:“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克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能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世界。”^[2]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30年代,随着以共和制为主导的民国社会的稳定发展,中国都市社会已开始展现一种繁华趋势(尽管有些畸形),这样也就使得中国都市小说创作开始呈现出一种蓬勃发展的势头,都市和都市生活逐渐成为现代文

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不过,认真考察20世纪30年代的都市小说的创作,人们不难发现,居住在都市的现代作家仍然常常是把自己看成是都市的“他者”,所有关于都市的看法和描写,都总免不了有一个乡村在做着对照。这样,中国现代小说创作在都市主题表达上,也就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点,也即在主题表达上呈现出了不同于欧洲现代都市小说的一些特质,尽管在创作观念和方法上,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创作受到现代西方文学的影响。

一、“异化”主题的东方表达

人的异化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所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有关“异化”的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反倒成了物质财富的奴隶,人没能主宰物,物倒控制了人。在西方,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物质的增长逐渐缓解了相对贫困的压力,然而,在巨大的物质力量下,人们却日益感到生命意义的缺失和精神信仰的困扰。因此,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创作,关注的重心逐渐转向人的存在意识、心理、感觉等方面,对异化的理解也更加深入到人的内心,尤其是对人的孤独感、迷惘感、荒诞感、焦虑感等情感困惑作了更深入的探讨和艺术表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西方文坛出现了一股以表现物质世界中人的非理性活动和表现世界的荒诞、虚无为主题的现代主义潮流。从中国现代文学生成和发展的维度上来看，随着“五四”新文学的兴起，西方文学的这股潮流也影响到了东方，影响了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特别是影响了现代作家的都市小说的创作，像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都市文坛的“海派作家”和他们的“都市小说”创作，如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便是如此，即便是被称为“京派作家”的沈从文，也是如此。

可以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都市，一些怀抱着各种理想和希望来到都市的现代作家，在一度震惊于都市文明的物质奢华后，很快就发现了隐藏于其背后的罪恶和丑陋。对于都市最初的瑰丽梦幻，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变为梦醒之后的失落与痛苦。如在都市文化的强迫性改造下，传统理想人格中的“情义”二字则很容易被功利化，人们最先感受到的便是都市里的人情淡薄，循着这条线索探寻下去，现代作家异常敏锐地体悟到了如同西方现代主义所表现的“异化”主题。尽管西方的荒诞和虚无感是建立在“上帝死了”的信仰缺失上，而现代中国作家对此的理解，则更多是出于对农业文明下的人际关系的温情回忆和对传统价值观念的不自觉的认同。然而，无论怎样，都市对于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同样也就成为了中国现代都市小说表现的首要主题。

都市看起来是如此丰富多彩，都市人自以为在追求张扬着个性，然而，在现代作家看来，都市里的一切都像是流水线上下来的商品，是最公式化、标准化的，都市的物是商品，都市的人、都市的情感也都成了商品。这一点，一直坚持以“乡下人”的眼光来打量都市的沈从文，看得格外清楚。《绅士的太太》这篇小说开头一节的写法，正是沈从文别有用心之处：所有的指称都是概括性的，绅士、太太、儿女；所有的事件也是概括性的，绅士和太太为了绅士总不缺少暧昧行为从吵闹到和解的通常程式，在这里，作者故意不加上多少个别的特性，因为在他看来都市里任何一个绅士家庭的面貌都是如此。“这个绅士是并不把自己生活放在例外的地位上去的”，“绅士明白每一个绅士太太，都在一种习惯下，养成了一种趣味”。在《如蕤》中，沈从文也发了同样的议论：“都市中人是全为一种都市教育与都市趣味所同化，……个性和特性是不易存在的。”所有的一切都“在商人手中转着，千篇一律，毫不出奇”。与沈从文坚持的“乡下人”身份不同，刘呐鸥是一个典型的都市知识分子，但在他笔下同样呈现了与沈从文相同的都市感觉。在小说《方程式》中，他表现了人如何变为一种只懂得计算的工具，

他里面所写的青年，是“都会产的，致密、明晰而适于处理一切烦琐的事情的数学的脑筋的所有者”，是连自己的婚姻都方程式般的处理掉的人物，完全是一个符合都市要求的标准的“方程式”。显然，在都市中，人不再是神圣的、伟大的，或者说已经不再是人本身，甚至只是都市的一个毫无特征的零件。

在沈从文的理想中，拥有灵性与自然的真正的人，必须到单纯淳朴的乡间去寻找。如蕤就是这样一个厌倦了都市生活的女性。她厌倦了那些“成为公式的男子与成为公式的爱情”，她向往着“固执的热情、疯狂的爱”，而这样的爱情在她的想象中是应该发生在“金黄色的稻草积上”的，这一意象正暗示了乡村生活对于都市病的治疗。如蕤爱上了一个“带着乡下人气氛的男子”，“单是那点野处单纯处，使她总觉得比绅士有意思些”，这种爱情事实上带有治疗的意义，用来帮助如蕤脱离公式化的都市生活。可是，在都市文明的强大攻势下，乡村的灵性能保持多久？沈从文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在他小说里，如蕤爱上了那个乡村青年也正在“慢慢的在学习都市中人的生活，他也会成为庸碌而无个性的城市中人”。因此，在沈从文看来，如蕤的爱情注定是失败的，充满自然灵性的乡村生活最终拯救不了都市人，而都市商业文明却会以其巨大的、不可征服的力量，将不断地侵蚀乡村，侵蚀自然，最终消灭人的灵性。无疑，沈从文对都市充满着失望和无奈。

如果说沈从文是因都市与乡村的巨大差异，而以“乡下人”的视角发现了都市的异化，那么，对都市更为熟悉和了解的“海派作家”，则更深刻地指出了都市中人异化的原因。“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曾创作过与《如蕤》类似的一篇小说《鸥》，只不过主人公换成了一个男子。《鸥》中的公司职员小陆在冷漠的都市里，在刻板的公文中感到深深的孤独，他常常缅怀童年时暗恋的情人，那个天真纯朴的乡村女子“吴老爹的女儿”，可是这一切都已随风而去。与沈从文笔下的如蕤一样，他的缅怀同样是对都市病的一种治疗，而治疗的手段是不约而同地往乡间寻找安慰，这正是对都市病的最东方式的认识和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与沈从文一样，施蛰存也意识到都市文明的强大力量难以抵挡，因此，在他的笔下，终于让小陆亲眼看到那乡村的情人，“在完全上海化的摩登妇女底服装和美容术里”，挽着一个摩登的都市男子向戏院走去。来到都市的乡下人，最终抵挡不住都市的物质诱惑，失去了人之初的自然纯真，成为了被异化的都市中人。

现代都市无疑是一个物质的商品世界，在欲望的无限膨胀下，人与人之间那种传统的温情脉脉的关系，

终于被商品、金钱和利益所控制。如果没有对人性纯真的终极信仰的坚守,人终将变成商品和金钱的奴隶。因为在一个畸形的商品社会里,“一切抽象的东西,如正义、道德的价值都可以用金钱买到”,情感同样可以被标上价格出售和消费。正如穆时英的小说《被当做消遣品的男子》中所描写的那样,爱情被都市男女当成了相互交换的刺激,男人、女人就像“雀巢牌朱古力、SUNKIST、上海啤酒、糖炒栗子”一样,互相消费并被迅速地排泄。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更是集中地述说着都市男女间可以被交换的欲望,述说着这个都市的荒诞。在这个道德混乱、人性变异的世界里,都市人的精神无所皈依,空虚变态。而施蛰存的小说则针对都市人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入描写,他笔下的都市人无不患有各种精神的疾病:忧郁、恐怖、妄想、堕入魔道、陷入梦魇。

在现代西方,异化而荒诞的都市生活,直接影响了西方人对世界的看法。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看来,所有的绝望感和虚无感都由此而生,因为“西方现代作家想象中的世界唯在城市”,他们会感到人身处都市而无处可逃,死亡是最后的出路和归宿。因此,西方现代作家在表现异化主题时,最终都指向了对人的终极意义的思考,探索人性及人的生存困境。但是,对始终有着乡村背景的现代中国作家来说,异化主题的发现却是基于异质文化冲突的结果,如同陈继会在《中国乡土小说史》中所谈到的那样:

异质文化的冲突(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导致了现代作家的两种觉醒:一方面是对古老的乡村文化的觉醒,他们以现代知识者的眼光去审视乡村……另一方面,是对现代都市文化的觉醒。20世纪工业文明对人类正常存在状态的危害与挑战,最先表现于都市。物欲横流,市声噪耳,灵魂焦灼。对于都市最初的瑰丽梦幻,变为梦醒后的失落与痛苦。^[3]

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都市小说的考察,人们不难发现,对于现代作家来说,都市始终是一个“他者”,乡村才是真正的灵魂所在,而这就是现代都市小说“异化”主题的东方表达的关键所在。因此,在中国现代都市小说创作中,人们很难真正看到类似西方文学所表现的人生绝望和虚无,而是异质文化冲突所带来的人生迷茫和对现代化社会的不适应感,就像施蛰存在《鸥》的结尾所感慨的:“在乡下,那迷茫的海水上,是不是还有着那些足以偕隐的鸥鸟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作家对都市小说“异化”主题的表达,更多呈现出东方式的对现代性的犹豫,从中反映出的是中国社会在传统与现代的选择中,在不同文化的冲突中不知何去何从的人生困顿感。

二、“漂泊”主题的现代表达

现代都市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隔断了人与自然的天然联系,每个个体都是孤零零的存在,人与人之间除了利益的关系外,似乎很难再有心灵的沟通,真诚美好的情感极度缺乏。在这样的环境下,都市人极易产生孤独感,内心总是处在一种无根的漂泊之中。梁启超曾对封建制度崩坏后的欧洲都市生活状态作了这样的描述:

变既太骤,其力又太猛,其范围又太广,他们要把他的内部生活凑上来和外部生活相应,却处处措手不及。最显著的就是现代都会的生活和从前堡聚的村落的生活截然两途。聚了无数素不相识的人在一个市场或一个工厂内共同生活,除了物质的利害关系外,绝无情感之可言,此其一。大多数人无恒产,恃工为活,生活根据,飘摇无着,好像枯蓬断梗,此其二。社会情形太复杂,应接不暇,到处受刺戟,神经疲劳,此其三。劳作完了想去耍乐,耍乐未完又要劳作,昼夜忙碌,无休养之余裕,此其四。欲望日日加高,百物日日加贵,生活日日加难,竞争日日加烈,此其五。^[4]

如果说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精神生活依然陷入“人生之路越走越窄”的存在困境,出现了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流浪感,那么,在西方列强的枪炮下被迫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都市,这种孤独、疲惫的都市生活感觉,更是伴随着异质文化的冲突而让人感到更强烈的生存压力和人生无着落的漂泊感。与中国古典文学中表达的“漂泊”主题相比,这一时期都市文学中的“漂泊”主题的表达显示出了其现代性的价值意味。像沈从文在《船上岸上》中所展示的那样,因想念母亲而“拥着薄被哭”的青年叔远,终于忍不住城市的冷漠与磨难,回家了,而留在都市中的是无家可归的“我”。茅盾《子夜》中的四小姐蕙芳,也仿佛是一颗乡间的小草被抛到了跑马场一般的都市里,无法适应却又无法回乡,“静坐的时候,她感到冰窖似的悲哀,但混在人堆里时,她又觉得难堪的威胁,似乎每个人都板起了得意的面孔在威胁她。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在这里,叔远、“我”、蕙芳,其实都是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被卷入都市的代表,不适应都市生活的回家了,无家可归的变成了都市的漂泊者。在某种程度上,在现代都市小说创作中,对都市或者乡村的选择,则是代表了对西化的现代文明或中国传统文化的选择,而在西方经济与

文化的强制性改造下，中国的都市人更多是被迫放弃了传统的生活方式，漂泊在都市的灯红酒绿之处。他们无法回归传统的乡村文化，却又难以适应现代化的都市，精神上呈现出无可皈依的空虚。因此，20世纪30年代的都市文学中，“漂泊”主题的表达与古代文学中的漂泊主题表现出了较大的区别。中国传统文学有大量对异乡漂泊主题的描写，像屈原的“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方”，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等诗句更是脍炙人口，深深表达了孤身一人漂泊在外的孤独与寂寞。但在传统的漂泊主题中，我们总能看到主人公不懈追求的精神力量，而这种力量正来源于作者对自己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的强烈自信。然而，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在喧嚣、淫佚的都市现实的嘲讽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人们一向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在都市中轰然倒塌，都市人已失去了对传统道德的自信。张灏指出，异质文化的冲击让中国人产生了三个层面的“精神迷失”：一是道德迷失，旧的伦理道德失范，新的道德却一时难以建构，形成道德真空；二是存在迷失，儒家的人生理想在现代社会被证明不合时宜，新的安身立命的存在意义又无所寻求；三是形上迷失，近代中国注重了对西方形下之器的吸收，却忽视了西方的形上之道，并未能对中国固有的形上之道进行创造性的改造，以致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5]以上种种都导致了现代人精神家园的崩塌。《子夜》中的蕙芳企图像吴老太爷一样用《太上感应篇》来巩固维系自己的道德信念，但终究归于失败。都市漂泊者再也没有了那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一个精神家园可以抚慰心灵，因此，他们的漂泊不仅是身体的，更是灵魂的无所皈依，精神的流浪漂泊。

精神家园的失落，加深了都市人的无家可归感，这样的孤寂的心理也许只有真正在都市中沉浮的人才能体会和了解。在新感觉派的都市小说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人物，他们没有家、没有亲人，他们流浪于都市的街头，不知从何处来，不知往何处去。就像《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他们出没于这个都市的交易所、商店、舞厅、夜总会，但在这个都市里却没有家，他们永远在路上漂泊，“前面是一条悠长的，寂寥的路”，他们只能绝望地呼号“辽远的城市，辽远的旅程啊”，却不知何处才是归途。没有家的都市人精神上是如此空虚和寂寞，他们的脸上总带着一种找不到归途的焦灼、迷茫和苦闷。《CRAVEN “A”》里的余慧娴深深地感叹“我是被从社会切了开来的”；《夜》里流浪的水手和寂寞的舞女一起轻轻地叹息“都是没有家的人哪”；《黑牡丹》里的主人公很明白他们“总有

一天会在半路上倒下来”，会“被生活压扁”。

都市里充满了这样的孤寂、茫然的灵魂，他们找不到生存的意义，却只能茫然地漂泊在都市中。他们离不开都市，但对传统社会的美好回忆又使他们不由自主地想要到乡村中去休憩身心。《黑牡丹》中的“我”和黑牡丹都是“在生活的浪尖上喘息的人”，故一有机会就来到乡村休养生息。施蛰存的小说《魔道》《夜叉》中主人公到乡间休养以治疗都市的病症——神经衰弱。沈从文小说《夫妇》中的“潢”，《三三》中的白脸少爷都是到乡下养病的城里人。在他们看来，都市人精神上的疾病，只有乡村的空气才能治得好，这正反映了都市人对于传统文化的那种始终摆脱不了的“恋母情结”。然而，乡村虽然仍被想象成母亲和家园，却终究已不能根治都市人的漂泊心结。《黑牡丹》中的“我”最后还是离开了乡村，尽管明知“总有一天会在半路上倒下来”；《魔道》中的“我”、《夜叉》中的卞士明都反而在乡村加重了病症，而《夫妇》和《三三》中那两个希望在乡间得到治疗的都市男子最后都没有达到目的，或怅然离去，或病重身亡。可见，对都市人来说，乡村已经是一个回不去的梦境，失落的传统精神家园已难以回归。

如果说古代文学的“漂泊”主题表达的是游子的寂寞，那么，在现代都市小说中“漂泊”主题呈现的却是孤儿的凄凉。这种“漂泊”主题的表达，已不仅仅是个体情感的抒发，更是呈现了整个传统文化的失落。由于现代中国都市的畸形发展是西方文明强行侵入的结果，中国的都市人面对的是骤然而来的文化的断裂。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他们匆忙割断了与传统世界的联系，投入陌生喧嚣的都市，接受了异质文化的强制性改造。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失去了传统文化家园，却尚未构建起新的精神家园，他们成为了精神的孤儿，难以获得生存的意义，所以，现代都市文学“漂泊”主题的表达也因此而呈现出与传统漂泊主题迥异的特质，流露出中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独有的焦灼、迷茫、孤独、颓废等精神特征。

三、“性爱”主题的新异表达

“性爱”主题一直都是文学特别是都市文学所热衷表达的对象。然而，基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规约，中国古代文学对性爱的描写要么是遮遮掩掩，要么是直陈其事。自“五四”新文学以来，“性爱”主题已突破这种表达局限，在30年代的都市小说创作中，性爱描写已不仅仅局限于对肉欲本身的描写或批判，而更多

的带有精神上的象征意义,性爱往往成为宣泄精神苦闷的一个途径。

荣格说:“人的心灵——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最主要的都是我们所谓有形体的、经验的与现世的事物之直接反射。”^[6]都市纷繁的光怪陆离的社会表现形态,可以说是都市人内心世界的对应性产物,如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人物在性爱追逐上的荒诞,正呈现出都市人精神上的病态。《残留》中的秦太太在丈夫丧事办完的第一夜就去做了“咸水妹”;《白金的女体塑像》中有着“一张节欲者的脸”的谢医生在情欲的催动下对着女病人的裸体想入非非;施蛰存甚至以现代都市人的心态来改写了“石秀杀嫂”这个故事,在他笔下的石秀由于情欲得不到满足而产生嫉妒才干出了杀嫂这样的行为。所有这一切发生在都市中的性爱故事,或都市人眼中的性爱故事,都无不表现出都市人精神上的空虚和变异。性的解放和性的束缚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中最直观的表现之一,因此,都市人在各种精神冲突中感受到的压抑与苦闷常常通过性的方式宣泄出来。

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现代都市小说中的性爱关系往往一改传统作品中男性主动的描写,而经常以女性作为强势的、主动的一方。无论是茅盾笔下的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还是穆时英笔下有着“猫的脑袋、蛇的身子”,能把男子当成刺激品的女性,甚至是沈从文笔下的都市女性如蕤,她们在性爱关系上都显得尤其主动,显示出都市女性的独立与叛逆。她们身上不再有“贤妻良母”的影子,她们或被称为“现代女性”,或被称为“魔女”“妖妇”,无论如何,她们都成为这个都市中最令人瞩目、最有现代感的风景。与之相比,都市中的男性似乎处处被动、处处失意,在日益变得活跃、独立、丰满的都市女性面前不知不觉便落了下风。从《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中那些被排泄掉的男子、《某夫人》中被女性玩弄利用的男子、《紫丁香》中“睡眠不足、贫血、潮热、神经衰弱”的男子,到茅盾笔下的要改造夫人反而被夫人抛弃的君实、屈服于桂奶奶的肉体的青年丙,一直到沈从文的《八骏图》中那些道貌岸然内心龌龊的教授,男人们一个个都那么虚弱、猥琐,最终在两性的较量中败下阵来。这种两性关系的设置,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男性作家在由传统社会到现代都市的环境变化中体验到的挫败感。女性在这里被作为现代生活的表征,她们的大胆放肆、她们的美丽多变、她们的高傲自私乃至她们的色相诱惑,可以说都是这个现代都市的表征,而男性在她们面前的失败恰恰意味着在现代都市中的失败。

在不少男性作家笔下都塑造着这样两类女性形象:一类是温柔而单纯的传统女性,具有传统社会的美好特征;一类是泼辣大胆的现代女性,具有现代都市社会的陌生品质。特别是在茅盾的笔下,这两类女性更是以对比的方式出现在同一篇小说中,如《幻灭》中的静与慧,《动摇》中的梅丽和孙舞阳,《诗与散文》中的表妹与桂奶奶。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前一类女性总是受到作者更多的关爱与怜惜,而对后一类女性,作家的感情就要复杂得多,既有赞赏,又有恐惧,既厌恶又不由自主地被吸引。用《诗与散文》中的比喻来说:传统女性是诗样的、是灵性的,而现代女性是散文的,是肉感的、现实的。男主角们在诗样的传统女性面前获得了欣赏的主动权,在肉感的现代女性面前却失去了从容,在与女性的对话中,中国男性第一次变得茫然失措。

在现代都市中,男性失去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支撑,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男性霸权也随之失去,而在“男女平等”的现代思想影响下,女性变得日益独立坚强。男性地位的下降和女性地位的上升,自然改变了原有的男女对话模式。当都市的男人在这些都市女郎的摆布下寝食难安时,在他们的心底不由自主地便会浮起了那些令他们感到温暖妥帖的传统女性的身影。所以,人们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美丽的、吸引人的现代女性总是被描写成“美艳的脸上淫亵的猥昵的靥笑”,或有着“蛇的身子、猫的脑袋”,在这样的描写背后有意无意地流露着作家基于传统伦理道德的眼光和情感态度,身处中国现代都市的男性作家终究难以完全摆脱传统文明的影子,在两性的描写中时不时地站在了乡村的立场,对象征着现代性的新女性表现出既被吸引又心怀疑虑的独特心态。

四、结语

“中国特色的都市是旧的拖住新的。”^[7]吴福辉曾如此断言现代历史上的中国都市。如果说在这里“旧的”是指中国的乡土文明和传统文化,那么“新的”都市文明更多地是指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都市现代文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基于西方现实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理念和中国的现实,毕竟有着极大的差距。在经过了对传统的乡土文明和现代的都市文明的双重批判后,人们终将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既很难在中国原有的文化中独立地产生,又不能把中国的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而必须是在中国独特的现代化经验积累过程中完成。当然,这个过程可能会显得更加痛苦

而漫长。在这当中，“旧的”便时会拖住了“新的”，传统的和现代的处处纠缠在一起。通过对 30 年代都市小说创作的考察，我们可以说其主题的表达，正是这一纠缠产生的一个奇异结果。在绮丽的、变幻莫测的都市表象下，在复杂的、不可捉摸的都市情绪下，沉淀着的依然是浓厚的传统乡土气息，或隐或现，形影相随，传统的乡土意识似乎是始终存在于现代都市作家的心里，与现代化的都市文明争夺着话语权，甚至抗拒着这种异质的文化。30 年代都市小说中的主题表达，正反映出了现代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心态：意识到传统文明的缺陷却又充满眷恋，被现代文明吸引却又感到恐惧。身在都市，心在乡村，在现代与传统的纠缠与拉锯中逐渐形成自身的一些创作特质。尽管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这种特质还面目模糊，但正是从这里开始，现代中国的都市文学创作才伴随着中国社会现代文明的进程，踏上了它艰难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 [1] 李欧梵. 现代性的追求[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11-112.
- [2] 鲁迅. 且介亭杂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C]// 鲁迅全集(第 4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08.
- [3] 陈继会. 中国乡土小说史[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2.
- [4] 梁启超. 梁启超游记[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13.
- [5] 张灏. 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C]// 近代中国思想史人物论·保守主义. 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7.
- [6] 荣格. 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M]. 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269.
- [7] 吴福辉. 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162.

The thematic expression of urban novels in the 1930s

GAN Yuhui

(School of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Hangzhou 310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30s, with the abnormal prosperity of the city in China, urban literature gradually went on the rise. Modern writers, on the one hand, are attracted by the modernity of urban civilization.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y stand in the posi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xamining and criticiz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urban civilization, especially the negative effec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s brought by the urban civilization. Therefore, as far as thematic expression is concerned, urban novels of the time often manifest a feature different from both modern western literature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In expressing some typical themes of urban culture which include alienation, wandering, sex and the like, there can be found entangling hints of modern western culture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is in this entangling and struggling that the thematic expression of modern urban literature, along with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is endowed with a unique connotation and modern value.

Key Words: urban novels; alienation; wandering; sex

[编辑：胡兴华]